

宗教文本翻译的社会文化影响 及其翻译理论之比较

田湘映

(中南大学铁道校区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在中西翻译史上,宗教文本的翻译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说明佛经翻译、圣经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的形成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作为各自发展先决条件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哲学等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 宗教文本; 社会文化; 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581(2003)-03-084-04

Contrastive study of socio-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ligious versions and the translation theory

Tian Xiangy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83)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version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se in view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 translation that the differences arising from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ranscription and the Bible are conditioned by socio-cultural influence.

Key Words: religious version; socio-culture; translation theory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中西翻译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材料和思想体系,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各种各样的差异。本文拟从佛经翻译、圣经翻译这两种宗教翻译形式中,探讨由此形成的翻译理论的不同。目的是想说明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都受制于与之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文化体系。

1 中西方社会文化不同,思想哲学不同,因而对于各自翻译实践的影响也不同。中西方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翻译的需求,往往成了翻译事业发展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如此。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的佛经翻译从

[收稿日期] 2003-07-06

[作者简介] 田湘映(1966-)女,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铁道校区外国语学院,讲师。

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时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唐代，是全盛时期；第四阶段，北宋，是基本结束时期。每一阶段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佛经翻译实践的影响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归纳起来无外乎：来自于统治阶级；来自于社会环境；来自于人民对于佛教的接受及认同。佛经翻译在历程上经过了（1）外国人主译期，（2）中外人士共译期，（3）中国人主译期，表现出对外域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吸纳的心态。

从西汉末年起，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地主豪强兼并抢夺，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因为人民大众渴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慰藉，企求神明能救芸芸众生于苦海深渊。

宗教是麻痹和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迷惑人民，磨灭他们的斗志。而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极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宣扬人的悲欢离合因前世而定。这些教义也符合中国人关于“富贵有命”、“生死在天”的人生哲学和传统心态，因此很容易为人民接受和认同。

佛经翻译在唐代达到顶峰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隋朝建国后不到四十年就给农民起义的风暴摧跨了。唐朝立国的统治者有了前车之鉴，接受了隋朝的教训，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巨大威力，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特权，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是稍微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意识的统治，对儒、佛、道都加以利用。佛教与儒教、道教和玄学等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在许多方面彼此相通、相融，而很快完全演化成为一门国教，佛经翻译也因此受到广泛重视，高潮迭起，经久不衰，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

圣经翻译之所以与佛经翻译在所经历的过程、形式、特点等方面各不相同是由于作为各自发展先决条件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哲学等方面的不同。圣经翻译起始的社会文化环境说明了翻译文化的一种模式，即翻译是民族、国家发展进步之需推动起来的；通过翻译的借鉴和沟通又转而推动了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在西方进入以《圣经》翻译为主的宗教翻译高潮之前，其译事活动早已存在。公元前4世纪末，繁

荣昌盛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帝国从政治、军事上取而代之，从原始社会进入到了奴隶社会，建立了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罗马与希腊彼此为邻，他们看到了古希腊灿烂的文化遗产，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罗马人开始大规模地翻译，把希腊文化移植本土，吸取希腊的典籍，模仿继承了希腊文化。但是这一时期，他们翻译的主要是世俗文学。

以圣经翻译为主体的宗教翻译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文译本《圣经·旧约》，因为是由72名犹太学者共同合作从希伯来文译出的，故称《七十二子希腊文本》。但是圣经翻译规模的真正扩大是在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进入中世纪前夕，罗马帝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挽救濒于覆灭的帝国，于是，他们加强对宗教翻译的支持。最初的基督教会是反对罗马帝国统治的，因而遭到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后来基督教慢慢被罗马统治者所控制，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于是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利用让人忍受苦难的基督教教义来麻痹人民。

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在所经历的过程、形式、特点等方面各不相同。圣经翻译历时悠长，从《七十二子希腊文本》开始，圣经的翻译就没有停止过，直至今日。而中国的佛经翻译到北宋时期基本结束。这是因为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形成的社会文化渊源不同，佛经翻译起始主要出于宗教信仰，而唐宋以后，凡是值得翻译的佛教经文献籍几乎全部有了中文译本；另外，佛教早已在华夏安家落户，人们更愿诵读由汉语撰写的经文，而无须依赖外文读本；这样佛教翻译就随着社会文化环境对其需求的萎缩而基本结束。圣经翻译不同，其形成的原因除了人们在宗教方面的需求外，主要是西方各国为了吸取希腊文化精华，另外，圣经本身就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西方各国、社会各阶层都对之高度重视，投入的人员众多。事实上，在把圣经译成欧洲各民族语言的过程中，圣经的翻译对这些民族的书面语的最终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对这些民族来说，圣经译本就是该民族的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因此，宗教翻译与欧洲各国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以上所要说明的是，翻译事业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制于相关社会文化的需要和发展。为了满足人们在文化上向希腊人学习，为了满足人们在宗教上的需要，圣经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翻译到西方

的各个语言中。

2 正如中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了各自的翻译实践,它们也同样影响和制约了各自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因素主要是指思想哲学层面对它的影响和制约。

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时期的哲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哲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道行般若经》说:“般若无所知,无所见”。这种对现象世界持并不肯定的态度,与魏晋玄学的“贵无轻有”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受到文人们的重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佛学翻译家们在了解并接受佛教的同时,就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发挥与改造了。这种发挥与改造,一方面是由于本国所具有的传统文化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定势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本国国情不得不如此。例如:道安以玄学之“本无”来解释佛学之“性空”;僧肇利用先秦哲学家们的相对论思维模式;慧远的“三报论”所阐述的因果报应理论与儒学的纲常伦理相适应。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美学理论的结合,还表现在中国佛经翻译的理论概念的表述、中心议题的讨论等方面。

从实质上看,翻译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时期,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概念,如用“本无”翻译“性空”。又如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法句经序》就借用了老子、孔子的美学观点“美而不信,信而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是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例证。

任继愈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即翻译界一直讨论的直译与意译。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张的,他认为,翻译时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他认为:只要在不违背

原本经义并且能传达经旨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他认为翻译的文辞如果太质朴,经义则不能很好地显露,显得深奥而难于理解,语言如果太一对一地直译、死译,经旨反而会显得更加遥远,不便于把握。

与中国佛经翻译理论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直译、意译之争一样,圣经翻译理论的形成之初,“直译”、“意译”两种不同翻译原则之间的争论在罗马时期就已开始。并在日后愈演愈烈,成为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

斐洛主张直译,他的翻译观点是:通语言,通上帝的神学者能从事《圣经》翻译,主张所谓“受上帝感召的翻译。”奥古斯丁这位古罗马后期的大翻译家支持斐洛的观点,《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但是同时,他提出在翻译中应注意根据不同的读者,采用“朴素、典雅、庄严”三种不同的风格,翻译中应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因此,他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的鼻祖,对后世的语言和翻译研究,影响深远。

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翻译家是哲罗姆,他提出了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认为在《圣经》翻译中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应采用直译,但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思想。

十六世纪,《圣经》翻译家威廉·雷尔克发表了《为忠实英译〈圣经〉辩护》,他在此的翻译理论观是:翻译可与信仰无关。他不同意把神学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只要译文符合原作的语言和意思,就不能说译者是不忠实原文的异教徒”;《圣经》翻译必须尊重语言习惯。他认为,译者往往可以按人民的实际而不按古代的方式来使用语言。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圣经》翻译家路德也主张采用人民的语言,主张意译。

3 由此可以看出,佛经翻译理论和圣经翻译理论在形成之初就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想哲学渊源。其区别主要表现在立论的实用性还是理论性、立论表达是神秘性还是非神秘性。这两种区别对后世中西译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就立论的实用性和理论性来说,中国佛经翻译侧重实用性,即注重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研究。支谦所谓“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提倡直译的方法;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讲究的是具体翻译操作中译者遇到的困难和该采取的方法;玄奘的

“五不翻”亦是谈论具体的操作方法。

西方更重视圣经翻译的理论性、抽象性。如：哲罗姆提出了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明确区分了直译和意译，而奥古斯丁更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把注意力从底层的翻译操作，提升到高层的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

就立论表达的神秘性和非神秘性而言，佛经翻译理论是“非神秘性”的；圣经翻译理论具有“神秘性”。这里所谓的“神秘性”是指翻译的宗旨是否只为宗教服务。中国的佛经翻译理论只适用于佛经翻译，这也是中国佛经翻译到一定时代就结束的原因。而西方圣经翻译往往有较强的宗教翻译意识。这从《圣经·七十二子希腊文本》那神秘的传奇色彩可以看出，七十二个译者在神的感召下，翻译出来的圣经居然一字不差。而斐洛和奥古斯丁所谓的“受上帝感召翻译”，其影响更是巨大。

翻译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圣经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渊源是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思想哲学。这种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影响各自后世的社会文化。但是，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各国文化将趋于融合，我们期待中西方翻译理论上的“同化”是不远将来的现实。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2] 胡 遂. 中国佛学与文学 [M]. 岳麓书社, 1998.

[3] 蒋述卓. 佛教传译与文学思潮 [M].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4] 孔慧怡. 从安世高的背景看佛经汉译 [J]. 中国翻译, 2001, (5).

[5] 李河新. 东晋道安之前的翻译理论 [J]. 中国翻译, 1994(3).

[6]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7] 申雨平.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8] 谭载喜. 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J]. 中国翻译, 2000(2).

[9] 谭载喜. 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J]. 中国翻译, 2000(1).

[10]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11]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2] 吴义诚. 中西翻译理论比较 [J]. 外国语, 1998(3).

[13]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14] 杨自俭, 刘学云. 翻译新论 [M].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5] Eugene A. Nid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 in Translation [M], SHAN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6]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M]. In On Translation edited by Reuben Br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